



【个人记忆】

我是复读生

□许志杰

还没弄明白咋回事儿，1977年12月的高考就以大败告终。春节的时候，父母亲问我还考吗，要考就提前去公社中学复习。当时有一点犹豫。为什么呢？我最好的兄弟，也是邻居家一起长大的哥们儿，生产大队有意让他当小队长。他就想把我也拉进去，弄个一官半职的干干。那时候毕竟年轻，没有权衡利弊的能力和耐心，况且第一次参加高考成绩太差，有点气馁。再者，觉得在生产队当个小干部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甚至从小就曾经立下过鸿鹄之志，长大了至少当一个能管着生产队长的官，现在机会来了，不想放过。后来，当官这事因为各种原因吹了，估计是因为我们家的成分太高，不能参与生产队的管理。于是，我那兄弟当了小队长，我于1978年的春天，背起书包，跟着在公社放映队工作的哥哥，来到位于公社驻地的潍县第九中学，当起了复读生。

学校说先搞个测试吧，看看能否跟上。我不知道测试的结果，哥哥当时也没告诉我。后来听说，测试成绩极差。学校的领导给我哥建议，要是能找个工作也不一定非要参加高考。意思很明了，估计怎么复习也考不上，基础太差了。但是，父母和哥姐都支持我拼两年，拼了才有成功的机会，不拼连唯一的机会都失去了。我哥哥、姐姐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加之“文革”，都未能读上高中，高考几乎不可能。他们

没有机会了，我不能再把到了眼前的机会浪费掉。考不上大学，考个大专、中专的也行，至少解决个工作。在哥哥的极力斡旋下，潍县九中勉强收下了我。刚开始，学校还没来得及分文理班，让我插班跟着应届毕业生一起上课，所有的课都上。我坐在全班最后一排的一个靠近门口的位子上，可能是班主任了解我的基础情况，安排个方便的位置，希望我听够了或者听不进去的时候，就自己从后门出去溜达溜达，散散心，不要影响其他同学。

想想那时候的我，的确挺为难的。学业基础那么差，是一个不合格的复读生，老师不拿着当干粮，同学也感觉你不是一碟菜。后来学校分科，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科，因为我听说，教文科三大课程语文、历史、地理的三位老师，都是科班出身，身怀绝技，教课有一套。特别是文科班主任张丕功老师，不仅授课有方，而且管理严格，像我这样自由散漫惯了的社会闲杂人员，亟须戴上一个金箍。与我一起复读的还有几位同学，似乎他们的课业基础都比我好，入学一个月之后，曾经有个摸底。应届生一个排名，复读生单独排名，我居然成功甩掉副班长的帽子，倒数第二名。这个成绩离大学校门当然还有很远，但毕竟进步了。这个成绩对我鼓舞很大，大就大在多少找到了一点学习的门道，进入了一个可能是比较顺畅的复读路径。让我感到大为惊奇的是，数学不仅没有剃光头，还得了几十分，这大概是我读高中及至复读得分最多的一次。大家都知道，文科生的数学考试，是挡在通往大学路上的一扇很难推开的大门。很多考生因为数学差才参加文科考试，而又因数学分数拖了报考著名大学的后腿。文科课程多以看、记、背为主，只要肯出力，脑子不是太笨拙，用上一两年的工夫，总会有收获，考不了高分，上个一般性学校还是希望蛮大的。数学就不一样，必须解决一个方案与公式的问题，需

要多元化的分析能力和思维方式，单凭死记硬背是不行的。数学又是100分的科目，一旦拉开就是十分到几十分，有时这不是全国重点大学与普通院校的差别，而是能不能达到录取线的生与死之别。

这次简单的摸底考试，不仅增强了我个人的自信心，似乎各个任课老师也发现了我的某些可塑之处。刚来时，地理老师辛允中先生每天傍晚去学校西边的河里钓鱼时，见了我总说：走，钓鱼去，上什么学？自那次摸底之后，辛老师再见我就不带我玩了，还问我“那道题会了吧”。原来辛老师从不提问我问题，这之后经常在一些同学答不上问题的时候，把我提溜起来。

可能现在的人们对于复读生没有多少概念，但在恢复高考之初的那些年，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只要家里有考大学的适龄孩子，就可能会有复读生。复读生群体由这样一些人组成，如我等在十年“文革”中读小学到所谓高中毕业的，功课底子极差，但因为年龄并不大，只有十七八岁，正是可以考学的年龄。这部分人主要集中在农村，因为城里这个岁数的孩子不少参加了工作。工作得有满足感，不想放弃工作复读考学，怕工作丢了，学也考不上。农村的孩子就无所谓，虽然到了劳动力的年龄，复读考大学是读书的事，只要家庭承担得了，生产队不会过于为难。于是乎，一大批农村的孩子涌到公社中学，形成一支数量可观的复读大军。这部分复读生学业基础很差，又有比较强烈的读书愿望，他们复读的时间也较长。我算幸运，在连续参加考试之后，终于在第三次考试中穿过独木桥，1979年高考如愿。我之后很多人又复读了几年，据说最多的到了七年，还是被大学拒之门外，不得不回家种地、娶妻、生子。

复读生中还有一部分人是“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他们毕业后或到工厂做工，或到农村种地，以前学到的知识随着日常生活中的忙忙碌碌，慢慢

流失了。这部分人复读的时间一般比较短，一年或者两年。他们学业基础好，复习一段时间，考上的就考上了，考不上的就回家劳动养家糊口去了，毕竟这帮人的岁数都近而立了，没有时间和精力再跟小他们十来岁的孩子拼下去了。

当时复读生多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录取比例低。1977年570万人高考，只录取了27万，录取率5%；1978年610万考生，经过扩招录取了40.2万，录取率7%；1979年468万考生，录取28万，录取率6%。如此低的录取率，直到1981年才突破11%，年复一年的积累，复读生能不多吗？

复读生是一个深嵌着时代烙印的特殊群体，他们肩负着家庭、社会和多人的多重责任，承担着常人无法理解和承受的压力。有的人成功了，迈向自己成功的彼岸；有的人则在复读的苦海挣扎多年，最后不得不遗憾地踏上回家之路。1978年高考时间全国统一确定在7月20、21、22日三天，第一天上午政治，下午历史，第二天上午数学，下午地理，第三天上午语文，下午是可考可不考的外语，23日也是可考可不考的外语口语。我没有参加外语考试。每门课程的考试时间为两个小时，上午7:30—9:30，下午2:30—4:30。

经过了四个月的复读，我的课业有了很大提高。在昌潍地区的一次高考拉练考试中，我的总成绩位列学校前几位。记得当时有一个小插曲，拉练成绩张榜之后，我也去凑热闹。一般规律是从上往下找自己的名次，教过我物理课的老师，看我在从上往下找，就非常幽默地打了个手势，让我从下往上找。结果让我和老师都很惊讶，不但没在下半部分，还成功攀上了上半部分。最终，那年我的高考分数是294分，离山东省大专录取线差六分。年底山东省扩招到296分，与我一起复读的我们生产大队支部书记压在线上，被益都教师进修学校录取，第二年春天入学。我则继续着复读生的追求与梦想，准备第三次高考。

【社会观察】

让她们不再说『Me Too』

□陈连祯

从2018年开春以来，“Me Too反性骚扰运动”如浪潮般席卷全球，连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也受到波及。由于负责遴选作品的瑞典学院女院士Katarina Frostenson的丈夫，也是著名摄影师Jean-Claude Arnault被指称为“文化圈之狼”，学院内外18名女性群起出面控诉其20年间性骚扰行为，导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宣布暂停颁发。

今年4月22日，中国台湾地区励馨基金会也在台北举办了“Me Too”大游行，主张为受到性骚扰、性侵害的女性推倒“看不见的高墙”，为她们“多陪一里路”，呼吁社会正视性骚扰问题。5月10日的新闻又报道新北市某医院外包公司的女员工在凌晨送药时被一名男同事趁其不备强吻脸颊，她向公司反映，竟得不到合理的对待，反被主管胁迫说“再有问题，两个都不要做了”。女员工不满在职场受到性骚扰且又更进一步感受到人格尊严被侵犯，于是向当地劳工部门提出申诉。看来，台湾地区“Me Too”运动可谓方兴未艾。

为什么“Me Too”的全球运动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呢？这要从受到性骚扰、性侵害的女



性心理感受去探讨。

在正常的情况下，异性相吸、两情相悦原本是美事一桩，如《诗经》中的第一篇《关雎》，就在描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美感及发乎情止于礼的节制。若爱慕出于欣赏，举止终于常理，则是人间佳话；如果出于性别的贬抑歧视，或带有性意味且令女

方感到不舒服的恶意骚扰，或过度追求，甚至是暴力胁迫造成伤害，则会让女性受害者心中产生难以磨灭的痛苦，将深深影响她日后的生活、人际关系与自我认同。这种被性骚扰的噩梦，可能让受害者一生难以回归正常生活。

这种宛如烙印在心中的

痛苦感，在《诗经·邶风·终风》的第一句，有非常传神的描述：“终风且暴，顾我则笑。谑浪笑敖，中心是悼！”这句话就是在描述受侵害妇女的心情，以急暴的强风来比喻女子丈夫的狂暴无常，一见到她就“谑浪笑敖”，极度歧视、贬低女性，以男尊女卑的高姿态来嘲笑或戏谑她，只是玩弄她的情感、身体，造成她身心受创而幽怨伤痛不已，这种痛苦想起来就令人忧愁感伤啊！挥之不去的屈辱感，令人辗转反侧而夜不能眠。这种描述又如《诗经·邶风·柏舟》所形容：“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观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可见先民对于此类受辱的心情，古今一致。

美国的安娜·贾维斯用她母亲生前最爱的康乃馨作为象征母亲节的花朵，而华人世界则以萱草(金针花、忘忧草)为母亲花。“Me Too”运动在全球卷起千堆雪，期望人人秉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反对性骚扰，并发扬母亲关爱保护子女一辈子的母性情怀，共同勇于拒绝一切性骚扰，让我们的母亲永远像忘忧草，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和谐世界里。